

民國人物自畫像史料的 價值評估

• 張玉法

摘要：本文以民國人物為例，分析日記、自傳、回憶錄和口述歷史作為史料載體的價值。以上幾種史料載體各有特色：日記作為每日生活的記錄、自傳乃作者自我描述的自畫像、回憶錄用作記錄自己的記憶、口述歷史以口耳相傳方式記錄歷史。而各種記錄孰真孰假，未能盡信。總括而言，上述四種史料載體有幾項共通點，分別為：自我中心品人論事、隱惡揚善，以及記錄內心世界與私密關係。除了日記因時間跨度而能夠顯示不同年代的自我以外，其餘三種載體均以某特定時間為基點，因此所記錄的形象未如日記般立體，更可能滲雜他人見聞作後期補足資料之用。以上四種史料載體或被作者用作樹立自己的正面形象而有所偏頗，但仍然能夠與其他史料取長補短，綜合分析，拼砌出歷史真相的全貌。

關鍵詞：民國人物 日記 自傳 回憶錄 口述歷史

日記、自傳、回憶錄和口述歷史一類的史料，自有史以來即陸續產生。日記是每日生活的記錄，但記些甚麼，記虛記實、記真記假，仍出自個人的考量。自傳是作者本人寫自己的生平事迹，是標準的自畫像。寫些甚麼，把自己畫成甚麼樣子，全由自己決定。自傳所用的材料，有些來自個人的回憶，可能還參考自己的私人文件或其他資料。回憶錄在理論上是將自己記憶的事物隨意寫下來，有些記憶不清的地方，也許會參考其他資料補充。有文字記錄以前的歷史，除遺物外，主要靠口耳相傳。即使在有文字記錄的時代，有些史料也是由口耳相傳而來。口耳相傳的歷史就是口述歷史，分為記錄的和未記錄的兩種。以下僅以民國人物的日記、自傳、回憶錄和口述歷史為例，評估其史料價值。所謂「民國人物」，是指在民國成立後有重要經歷、對民國歷史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此處只能舉例說明，不可能將所有生活在民國時期的人都作為民國人物來檢討，雖然所有生活在民國時代的人物所留下的自畫像資料都是史料。

一 日記

所謂「日記」，是指個人逐日對自己的身心活動、所接觸到的事物，以及所見所聞所作的記錄，有詳有簡，有的記數事，有的記一事。民國人物的日記，其數量無法估計。有些已經出版，但絕大部分是未出版的，而所謂「民國人物」，有家喻戶曉的，有鮮為人知的。因為每一個人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日記所留下來的史料性質亦不同，但所有的日記都有史料價值。在出版的日記中，以胡適日記最有名；在未出版的日記中，以蔣介石日記最有名。其他已出版的日記甚多（以下所引均為最早出版的年份），如《馮玉祥日記》（1930），《魯迅日記》（1951），《張謇日記》（1962），《李漢魂將軍日記》（1975），《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1986），《王世杰日記》（1990），《邵元沖日記》（1990），《徐永昌日記》（1990），《白堅武日記》（1992），《鄭孝胥日記》（1993），《胡景翼日記》（1993），《丁治磐日記：手稿本》（1994），《愛新覺羅·溥儀日記》（1996），《吳宓日記》（1999），《蘇雪林日記》（1999），《楊度日記》（2001），《王子壯日記》（2001），《陳克文日記》（2002），《李仙根日記·詩集》（2006），《顧頤剛日記》（2007），《朱自清日記》電子書（2012），《吉星文先生日記》（2015），《胡宗南先生日記》（2015），茲不多舉。

日記有原稿，有抄稿，有出版稿；一般說來，以原稿最為可信，但有些原稿事後也經過塗改，蔣介石和胡適的日記都如此。抄稿有抄錯，有節略，有修改。譬如1927至1939年間，蔣介石的秘書毛思誠參考蔣介石的日記，為蔣編年譜，同時將蔣的日記分為黨政、軍務、雜俎、文事、學行、家庭、旅遊、身體、氣候九類抄錄，稱為「九記」。經學者比對，「九記」與原日記相差甚多，部分因為毛在抄錄本中加了別的史料，而蔣又對抄錄本加以修改^①。「九記」完成後，蔣介石又命奉化同鄉王宇高、王宇正仿「九記」編「五記」，即〈困勉記〉、〈遊記〉、〈學記〉、〈省克記〉、〈愛記〉。「五記」體例與日記不同，係以第三人稱編寫，以「曰」、「公曰」、「自記」、「記曰」等引述日記文字。1918年以前，且係參照相關文獻及日後之追述輯入；1918年以後，亦非照日記原文抄錄，而是有所潤色或增刪，有些內容不見於日記原文，而是引錄其他資料^②。至於出版的日記，如涉及隱私、政治敏感、毀謗或傷朋友和氣，有可能改之又改。

日記作為史料，閱讀起來有些困難，譬如記朋友不稱名而稱號、記親戚和家人不稱名而稱親屬的稱謂或暱稱、對不便直說的事有些隱諱語，以及所記事件的背景不明等，都增加閱讀的困難。

日記作為自畫像，有些毫無保留地暴露自己，並盡可能地記載有關事務；有些記事簡略，如有較詳記事，或記錄他事，隱藏自己；或以自我為中心，品人論事。讀者對諸多日記，往往有不同的觀感。魯迅讀《越縵堂日記》，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張昌華讀《蘇雪林日記》，則覺得是毫無矯飾的生活獨白^③；據桑兵閱讀日記的印象，吳宓的日記反映其感情的偏執，朱自清的日記可見其內心深處的自卑^④。

一般說來，日記資料支離破碎，非仔細拼圖，難見完整面貌。但日記所呈現的是作者不同年代的自我，與自傳、回憶錄、口述歷史所呈現的是「現在架構的自我」不同。日記記事簡略，作為史料，通常不會太完整。不過日記中

所寫，對一般人而言，常有內心世界和心路歷程的記述，並顯示人際關係；對負責大小事務的政治人物而言，除內心世界和心路歷程外，常有決策過程的記載，亦顯示公務處理中的私密關係；此為一般公開的檔案和史料所少見。此處僅以蔣介石日記和胡適日記為例作一說明。

《蔣介石日記》(以下簡稱蔣日記)，從1915年起記到1972年，凡五十七年，450萬字。其中1915、1916、1917和1924年四年之日記失落，1915年的日記僅存十三天，實際上只有1918至1923年和1925至1972年，共五十三年。因為這五十三年，蔣或在孫中山左右，或獨自負責國家要政，為民國歷史留下了重要史料。蔣日記初由自己保管，1975年蔣介石死後由其子蔣經國保管，1988年蔣經國死後由其子蔣孝勇保管，蔣孝勇死後由其妻蔣方智怡保管。蔣介石原望其日記存於台灣，在其逝世五十年後(2025)開放，後因蔣孝勇夫婦移民加拿大，日記乃被帶到該處。2005年蔣方智怡將日記移存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並授權該所保管，2006年起分批開放蔣日記給學者作為學術研究資料。

蔣介石是民國史上最煊赫的政治人物，他的大半生為國家領袖，看來道貌岸然、威風凜凜，但在日記中則毫無隱諱地記載他的喜、怒、哀、樂、愛、惡、欲。譬如在私生活上，1921年9月25日寫道：「日日言戒色，日日不戒，反而招之，尚有人心乎？」1943年6月8日寫道：「近悖情暴戾不能自制，修養靜坐孜孜不息已三十年，而德性毫無進步，且驕慢暴戾益甚。斥人之短，責人益愚，公私兩傷。」1947年11月1日寫道：「正午與妻在庭園野餐，良辰美景，日暖風和，夫婦敬愛，心神怡懌，不能言喻。」譬如在對政府官員的觀感上，1927年8月8日寫道：「余以為對同志應退讓，對敵人需堅持，而汪乃異其是，誠非人類也。」(時汪精衛已繼蔣介石以後在武漢實行分共，但仍反蔣)。1941年10月16日寫道：「〔胡適〕使美四年，除謀得十餘個名譽博士外，對國家與戰事一無貢獻。」譬如在對抗日戰爭的決策上，1931年9月24日(「九一八事變」以後)寫道：「與其單獨交涉而簽喪土辱國之約，急以速了，不如委以國聯仲裁，尚有根本勝利之望。」1932年5月27日寫道：「與王季文〔桂系與中央的聯絡人〕談話，彼有幾分觀察力，他說階級鬥爭急於民族鬥爭，暫失東北，令倭寇為我防範蘇赤。」1937年7月26日寫道：「遭必不能免之戰禍當一意作戰，勿存避難之想矣！」11月13日寫道：「抗戰最後地區與基本戰線，將在粵漢、平漢兩鐵路以西。」^⑥

蔣日記開放後，使史學界掀起研究蔣介石的高潮。主要原因可舉三點：其一，自192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蔣介石經常主持國家大政，蔣日記為民國歷史發展提供了提綱挈領的脈絡；其二，民國政治上的許多決策過程和人事變動關鍵，蔣日記常有其他史料所不及的信息；其三，蔣介石主政期間，無論居何職位，甚或短時間下野，都以國家興亡為己任，蔣日記經常記載蔣如何在死中求生、滅中求存的各種謀略。

在軍國大事上，蔣日記所載雖然很少超過前此的研究，但決策的過程常能在蔣日記中找到。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英兩國為誘使蘇俄對日宣戰，在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中，密允戰後蘇俄可恢復原來在中國東北所享有的利權，並讓外蒙獨立。事後，蔣介石受美、英壓力，與蘇俄談

判訂立友好條約。蔣於1945年7月5日即考慮讓外蒙獨立(實則外蒙早已在蘇俄扶持下獨立,惟中國不予承認),以換取蘇俄在新疆、東北和中共問題的談判上讓步。次日,外交部長王世杰建議蔣在外蒙主權上讓步,蔣遂作最後決定。《王世杰日記》謂蔣接受他的建議,事實上在王提出建議前,蔣已作此考慮^⑥。自蔣日記開放後,前往胡佛研究所參閱日記的學者不下數百位,楊天石用功最深,曾三度前往,對日記閱讀的時間最多、依據日記寫成論文者亦最多^⑦。蔣日記的記事有時雖然非常簡略,但常有重要歷史線索。譬如,楊天石看到日記中有「運動德國軍隊倒戈」、「派齊焌(國民政府駐德武官)赴瑞士」等語,即查閱國民政府檔案、宋子文檔案等資料,探討蔣參與德國內部推翻希特勒的計劃。但該文多用齊焌的報告,又無德文資料可資佐證,論證未必令人信服,故引起學者質疑^⑧。雖然如此,楊天石發掘問題、研究問題的精神仍令人敬佩。此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機構於2010年12月以「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為題,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可以看出蔣日記在民國史研究上的重要性^⑨。

胡適是民國史上最著名的文化人物,1910至1917年留學美國,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並參與《新青年》的編輯工作。1920年代曾辦《努力週報》,1930年代辦《獨立評論》,並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仍任北大教授。抗戰期間任駐美大使四年,1946至1949年任北大校長,1957至1962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日記有三個版本,當以遠流出版公司出版的《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89)為最早,共十八冊,是1921至1962年間的日記;其次為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適日記全編》(2001),共八冊,是1910至1962年間的日記;再次為聯經出版公司的《胡適日記全集》(2004),共十冊,是1906至1962年間的日記。其他選刊本和短時期的日記出版者不論。需要說明的是,日記的年代雖然大體可以接續,中間缺略甚多^⑩。

胡適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替歷史作見證,因此他對與自己有關的或自己有興趣的資料,都隨時寫在日記裏。縱覽他的日記,內容龐雜,包括上課、去圖書館、寫文章、做考證、開會、講演、訪友、友人來訪、與朋友餐敘、打牌、醫病、旅遊、出國、對時局關懷、為危局謀對策、參加國事會議、參與總統競選提名,甚至抄錄與朋友往來的書信、寫一篇文、寫一首詩、附一紙公文、剪貼報紙,還有英文文件等。他不僅隨時記,而且有機會就發表、就出版,無所顧忌。主要因為胡適為人開朗,日記所載,笑罵由他。由於胡適處身北大,交遊廣闊,倡導新文體、宣揚新思想、有心改良政治,不僅在教育、學術、文化界結識許多朋友,並常隨這些朋友出入於政府,更成為政府借重的對象、青年人的崇拜人物。退位的宣統皇帝召見過他,他又協助反蔣的汪精衛起草過「約法」,是蔣介石的座上常客,也做過國防參議會委員、駐美大使和國民大會代表,加上官場、學界的朋友眾多,因此經歷、見聞多,日記中所記亦多。雖然如此,胡適究為政府圈外的人物,他的主要影響力仍是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所以如果將他的日記作為自畫像的材料是珍貴的,但對民國史的發展只能在側面反映一些。

胡適在文化界初露頭角是從他在美國留學時期提倡白話文開始,其後回國到北大教書,進入全國最高教育、學術、文化圈,並在此圈子內為宣揚西

方思想最活躍的人物，藉參與《新青年》社務及創辦《努力週報》而宣揚其新思想及政治理念，成為自由主義的導師，一方面對抗民國建立以後的專制餘孽，另一方面則對抗隨五四運動和俄國革命而來的共產主義思潮。胡適在民國歷史上的地位奠基於此。胡適日記雖然雜亂，但字裏行間常透露一些民國史上的重要政治信息。茲舉例證如下：

其一，胡適雖然被譽為「五四健將」，但他卻反對學運。1921年9月25日的日記附有是日夜寫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一封長信談校務改良，提到學運的困擾及限制學運的辦法。學運的困擾是：「上週學生已有要求廢考試的大會，本週又藉山東問題為名，明日起即出外講演。講演人數自必不多，但此等人即可藉此搗亂。稍一不慎，即難收束。」所提限制學運的辦法是：「一、十月一日學生猶有未到者，休學或除名。二、自十月一日嚴行查課點名。」又10月11日的日記記錄其演說：「……學生宜有決心，以後不可再罷課了。今年事變無窮，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們應該決心求學。如果實在忍不住，儘可個人行動：手槍、炸彈、秘密組織、公開運動都可以，但不可再罷課……」

其二，中原大戰期間，協助汪精衛起草約法。1930年汪精衛與閻錫山、馮玉祥等，因蔣介石實行訓政，未遵孫中山遺教行約法之治，聯合反蔣，雙方都派人爭取張學良的支持。汪精衛等起兵之後即起草約法，並聘胡適等為起草委員。1930年10月11日胡適日記記云：「下午與鈞任〔羅文翰〕談約法問題，我們的主張大致相投，大意如下：(1)約法為憲法的預備，決不是訓政的約法……(2)約法第一部分應規定人權……(3)第二部分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應規定聯邦式的統一國家。(4)第三部分為政府組織，我主張有一個議會，……晚間到中原吃飯，……復初〔郭泰祺〕拿了精衛一稿來和我與鈞任商議。原夾有三條辦法，皆對東北〔張學良〕提出者：……我勸他們，……不如說約法、憲法與國民會議等……」10月12日日記：「今天報登汪閻馮一電，主張已與我們昨夜所談相近了。」

其三，張學良在發動「西安事變」前早已與中共有私密接觸。據1936年12月13日日記，當時政學界已有人知之。胡適記云：「他的勾通共產黨，政府久已知之。七日之夜，詠霓〔翁文灝〕問我此事，我還不信。到今日我才知道，他在九月二十九已有圍搜黨部之事，其原因是黨部搜得他勾結共黨之證據。此次他往洛陽把蔣接到西安，竟下此毒手！」^①

胡適日記所載各方面的秘辛甚多，上面所舉只是政治史料中的一些例證，研究教育史、文化史以及人際關係等方面的材料尚多，而諸多材料為胡適日記所獨有，是相當珍貴的。不過，胡適在日記中頗注重維護自己的形象，對感情世界隱晦、掩飾，對不利於己的事很少記載，偶有記載，事後又塗抹刪削^②，並不是甚麼都記、甚麼都願意讓人知道。

二 自傳

民國人物的自傳，在時間上跨時代者多，多出版於1950年代及以後，數量較日記、回憶錄、口述歷史為少；如果將一些自述性的書歸類為回憶錄，則自傳性的書更少。較為著名的自傳，有胡適《四十自述》(1933)，沈從文

《從文自傳》(1934)，溥儀《我的前半生》(1964)，陳獨秀《實庵自傳》(1967)，《顏惠慶自傳》(1973)，《董顯光自傳：一個中國農夫的自述》(*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rmer*)譯本(1973)，《陳濟棠自傳稿》(1974)，趙元任《早年自傳》(1984)，《馮玉祥自傳》(1988)，《枕上夢回：李漢魂吳菊芳伉儷自傳》(2012)，餘不多舉。絕大部分以「自傳」為名的書，都是回憶錄性質，多憑記憶材料而寫，很少參考其他史料。

自傳是當代中國最流行的文書之一，求職、入黨、申請學校，以及中共對幹部的思想審查，都需要寫自傳。寫自傳的資料，有些來自自己的回憶，亦或參考其他資料。嚴格說來，寫自傳應像為他人寫傳，應盡可能地運用各種資料，加上自己的回憶資料，使傳記寫得更完整，但到目前為止，這一類的書還很少見，所見者仍多為回憶錄性質，其較為近似者為《馮玉祥自傳》。《馮玉祥自傳》寫於1929年1月，時北伐初完成，馮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他於養病期間所寫的自傳稿，不僅敘事，還引用若干文件，可以自傳視之。馮寫此書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為「與其人為之而失其實，不如自為之而得其真」，另一為「事之來也，又恆激於義憤，為人所不敢為，以故世皆驚疑駭怪，非余自言之，人固莫知其所由，亦莫明余為何人」。馮怕別人「閉門造謠，既或訪聞之不周，復以愛憎為褒貶」，「是故不計學之淺、文之俚，遂將余之生平而約略筆之於書，然其中固未敢有一事之偽，一言之妄，自欺以欺人也」^⑩。

馮玉祥，安徽巢縣人，十六歲(1896)投入銘軍。此後的馮玉祥，依照他自己的描述，是一個敢做敢為的軍人和軍官。他自幼苦學，研讀經史和兵書，生活節儉，戒鴉片、戒酒、戒賭，為孝子、為忠臣。及知滿清入關時曾大殺漢人，乃傾心革命。馮初信佛、道，及至1913年在北京見基督教不准婦女纏足，不准吸食鴉片，不准飲酒、嫖、賭，乃改信基督教。又到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基督教徒無一仗義執言者，馮與英國牧師谷約翰(Jonathan Goforth)言及，後者謂在上海示威者為亂黨，應加屠殺，馮遂認基督教為帝國主義欺人之工具，乃又鄙視之。在此前後，馮在政治思想上開始信服三民主義。至於馮的軍旅生涯，其銘軍於1901年改編為淮軍(是年李鴻章病逝)，1902年馮又辭淮軍而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先後隸屬第六鎮和第二十鎮，1910年任第二十鎮第三營管帶(營長)。1911年武昌革命爆發，馮駐軍灤州，曾參與起兵，響應武昌革命，事雖失敗，清帝終退位。

民國初年馮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駐軍四川，曾響應雲南的反袁世凱稱帝運動。1917年張勳復辟，時馮已調為直隸南路巡防統領，段祺瑞復以馮為第十六混成旅旅長，討張勳。張勳被平，段祺瑞擬另選國會，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段派大兵南下進攻，1918年馮玉祥通電主和，一度被革職。嗣後馮陸續聯合其他將領主和，終有1919年南北兩政府之議和。次年段祺瑞失勢，曹錕、吳佩孚一派軍人操持政治，馮部隸屬曹、吳。1923年曹錕賄選總統，次年孫中山、張作霖、段祺瑞聯兵進攻曹、吳，馮玉祥被曹錕任命為第三軍總司令，抵抗張作霖的部隊，馮中途撤兵回北京，囚曹錕，逼之下台。之後段、張先後主政，馮將退位的溥儀皇帝逐出清宮。此後馮不容於張作霖，其勢力被張逼往西北。及國民革命軍北伐，馮投入國民革命軍，與蔣介石合作，完成國家統一。

馮玉祥在自傳中，不僅強調其求進步、喜革命，並花了一半的篇幅寫其多次的革命之舉，而且也特別立章節敘述其如何治軍、戡平內亂、從事兵工建設、從事政治建設，以及辦理外交事務。最後在「今後之志願」一章中表達：「今後之希望，也唯三民主義之早日實現而已。」^⑭馮在寫完本書之後即因裁軍問題與蔣介石鬧翻，「九一八事變」後又因蔣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與蔣失和。全面抗戰開始後，雖曾被任命為戰區司令長官，亦未盡心抗日，轉而同情中共，1948年9月燒死於自美國回中國參加政協會議的船中。馮玉祥晚年曾經口述、並將記錄整理出版了《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⑮，對蔣的專制獨裁大加批評——如果《馮玉祥自傳》寫在當時，不知馮的自畫相貌又如何？馮的自傳寫在早年，無法據以了解他在晚年如何看他自己，其他自傳亦大多如此。

另外，有兩本廣東地區國民黨軍政大員所寫的自傳，時間跨度較長，可以反映民國初年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亦可反映民國史的不同角度，即《陳濟棠自傳稿》和《枕上夢回：李漢魂吳菊芳伉儷自傳》。

陳濟棠，廣東防城人，1908年加入同盟會，一生都在國民革命陣營。自謂：「余自革命以來，除救人救國之外，別無其他目的，故無論從政從軍，均本此意以赴，絕不稍有變移。」^⑯自傳中的敘述頗為平實，很少見有激憤之語。一般史論或謂陳濟棠「長時間主政廣東，政治上與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經濟、文化和市政建設方面頗有建樹，有南天王之稱」^⑰，但陳濟棠在自傳中所述則是支持孫中山、支持蔣介石，力主不與中央對抗；如與中央意見不合，則以出國考察之名以避之。陳濟棠幼受軍事教育，入粵軍第一師後地位漸顯。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第一師擴編為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陳銘樞任第十師長，陳濟棠任第十一師長，張發奎任獨立旅長。北伐之初，李濟深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留守廣東，陳銘樞、張發奎（第十二師長）率軍北上，陳濟棠在廣東南部剿匪，因與中共關係不睦（時國民黨聯俄容共），於1927年春赴蘇俄考察，6月回國，仍任第十一師長，余漢謀任副師長。時國民黨已清共絕俄，陳濟棠在廣東東北的豐順迎擊自南昌暴動失敗的葉挺獲勝，官至第四軍長、廣東省長。此後桂系反蔣，閻錫山、馮玉祥反蔣，陳濟棠均支持蔣。1931年胡漢民為蔣扣留，陳不主廣東與中央對抗；1932年陳銘樞在福州另立抗日政權，陳濟棠則派兵討伐。1936年6月發表抗日主張，發兵北上，為政府制止，即出國考察，直至次年9月抗戰全面爆發，始返回國內。抗戰期間先後任國民政府委員、農林部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1949年初，任海南行政長官，1954年死於台灣^⑱。

上述陳濟棠一生經歷，大體依照自傳所述。但自傳行文簡略，不僅任官的轉折交代不清，對其在諸多事件中的角色亦含糊其辭。譬如，1936年發兵北上抗日事，寥寥百餘字，僅謂中央以抗日時機未成熟，即出國考察。但據學者研究，陳濟棠係以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為由，聯絡廣西李宗仁，發兵入湘。蔣介石一面派軍南下制止，一面策反廣東第一軍長余漢謀、第二副軍長李漢魂以及廣東空軍，余並電陳濟棠限其二十四小時離粵，陳始下野。又陳濟棠標榜一生反共，但政府於江西剿共期間，陳與中共訂有互不侵犯條約，1934年中共中央率軍於江西、廣東邊境西走，陳即網開一面^⑲。

李漢魂，廣東吳川人，其自傳寫於晚年，係從其較長的自傳文稿《夢回集》中整理而出，據說不及原稿（寫於1955至1977年）的十分之一。作者自稱，因為包括太廣出版不易。僅就已出版的自傳來看，李漢魂與陳濟棠一生的政治生涯主要都在廣東，兩人都出身於李濟深的第四軍，但李漢魂資歷較淺，後來與陳也屬於不同的派系。李漢魂早年參加同盟會，受軍事教育，1925年在第四軍十二師任參謀。北伐之初，張發奎為第四軍十二師師長，率兵北上，李漢魂任三十六團參謀。蔣介石分共，寧漢分裂，張發奎支持在武漢的汪精衛，繼續容共，並繼續北伐，李漢魂升為該軍三十六師師長。武漢分共後，汪精衛不與寧方合作。張發奎率部回廣東，謀驅逐桂系的李濟深，但為桂系所敗，之後再向蔣介石輸誠。北伐完成後，第四軍縮編為第四師，張發奎任師長，李漢魂任副師長。1928年桂系起兵反蔣，張發奎繼之。兵敗之後，張發奎通電去職，李漢魂走香港。1933年李漢魂受任為廣東東區綏靖主任，率軍駐防粵東。1936年發生一宗日人在汕頭走私事件，日本派艦至汕頭海域示威，廣東省主席陳濟棠不欲生事，李漢魂辭職赴港。繼而，陳濟棠以抗日為名率軍北上，為中央軍所阻，辭職下野，李漢魂得復職。抗戰爆發後，李升為六十四軍軍長，嗣任廣東省主席。抗戰末期，李因與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不和被調職。戰後初任第三戰區副長官，繼為衢州綏靖公署副主任，終辭職赴美。李宗仁任代總統期間，李漢魂曾回國任內政部長，後隨李宗仁赴美定居，死於1987年^②。

上述李漢魂一生的政治生涯，大體本於李的自傳，但諸多衝突性的人際關係，如與陳濟棠的關係、與余漢謀的關係等，多未能作清楚的交代。研究廣東政界諸多人物的關係，尚無法從他們的自傳中弄清楚頭緒。

陳濟棠和李漢魂自傳只是例證。一般說來，寫自傳的人，對純屬個人私事，或與別人無牽扯的公事，可以放膽寫，遇到容易引起別人反感或反擊的事，則盡量含混其辭或略而不論。不然，即使對方已不在人世，對方的家人、戚友、部屬也會有所反應，甚至對簿公堂。這是自畫像的難處，也是運用自傳一類史料所當注意之處。不過，自傳像日記、回憶錄、口述歷史一樣，常能自明本志、自我懺悔、自我解嘲、自我總結，能刻畫鮮明的自我形象和個性^③，這是外人寫傳所難及的。

三 回憶錄

回憶錄的寫法，在理論上，通常是就記憶所及，寫出自己平生中的種種經歷、見聞，以時間先後為序；亦有採隨筆體，立不同的題目寫不同的事物者。大多的回憶錄由出生寫至停筆時，亦有寫一段時間或一件事情者。在所有民國人物自畫像的出版物中，以回憶錄的出版最多。寫平生經歷、見聞的回憶錄，有鄒魯《回顧錄》（1944），黃紹竑《五十回憶》（1945），《陳布雷回憶錄》（1949），陶希聖《潮流與點滴》（1964），齊璜《白石老人自述》（1965），劉峙《我的回憶》（1966），《劉汝明回憶錄》（1966），《吳鐵城回憶錄》（1968），《曹汝霖一生之回憶》（1970），張忠絨《迷惘集》（1971），張國燾《我的回憶》

(1971)，李璜《學鈍室回憶錄》(1973)，《李品仙回憶錄》(1975)，《蔣廷黻回憶錄：蔣廷黻英文口述稿》(1979)，黃炎培《八十年來》(1982)，《張治中回憶錄》(1985)，《鄭超麟回憶錄：1919至1931年》(1986)，《徐永昌將軍求己齋回憶錄》(1989)，《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1992)，《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1994)。寫早年回憶錄者，有《施肇基早年回憶錄》(1967)，《閻錫山早年回憶錄》(1968)。寫留學生活者，有王覺源《留俄回憶錄》(1969)。寫一段從政和軍旅生活者，有陳公博1932至1936年主持實業部期間的《四年從政錄》(1936)，陳果夫1932至1937年任江蘇省主席期間的《蘇政回憶》(1951)，金問泗《外交工作的回憶》(1968)，陳立夫《戰時教育行政回憶》(1973)，陳公博記1925至1936年間從政生活的《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1979)，《張發奎將軍抗日戰爭回憶錄》(1981)，黃杰《海外羈情：留越國軍紀實》(1984)。側重寫文化思想變化者，有蔣夢麟《新潮》(1959)，胡光廙《波逐六十年》(1964)，蔣夢麟《新潮》(1967)。寫一歷史事件者，有蔣介石寫《西安半月記》(1937)，孔祥熙寫《西安事變回憶錄》(1950)，張學良寫《西安事變懺悔錄》(1950年代)，李金洲(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秘書)寫《西安事變親歷記》(1972)。

諸多回憶錄，無論為自敘平生，亦或寫一生的某一段或某一事，都是以個人的主觀立場寫出。因為主觀，難免誇大自己、忽略別人，甚至傷害到別人。有人警覺到會傷害到別人，有些事情不便寫出真相。這種情形，黃紹竑在寫《五十回憶》時曾有所說明。他說：「因為怕得罪人，所以許多重要事實，就要因人而隱諱，不敢公然直陳。」另一方面，亦有些人無中生有，對仇敵借機謾罵。特別是黨政軍方面的要人，今日為敵，明日為友，或初為長年密友，又轉為長年仇敵。若一生大事都在敵友矛盾中，就很難着筆。黃紹竑自承：「在滿清時代成長，而參加滿清的革命；在廣西舊軍閥底下當軍官，而起來推翻舊軍閥；曾與中共合作，而又與中共作戰；曾擁護中央，而又反對中央，後來仍然擁護中央。」²⁰個人的政治立場不斷改變，寫回憶錄就很困難。

事實上，無論為敵為友，在同一歷史事件中，不同參與者對該事件的回憶往往不同。例如，1926年3月20日廣州「中山艦事件」，蔣介石突然鎮壓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勢力，大捕共產黨人，圍繳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俄顧問團的槍械。之後，國民黨中央決議：共產黨份子退出國民黨最高黨部，禁止共產黨批評孫中山主義，共產黨及青年團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及團員名冊，繳存國民黨。這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感到震驚。根據時任中共中央委員的張國燾回憶，中共中央決定採取妥協政策，派張國燾前往廣州，勸使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稍作收斂，張並訪蔣介石，表達繼續合作意向²¹。但彭述之則寫文批駁，引據陳獨秀1927年12月10日〈告全黨同志書〉，謂中共在接受國民黨中央決議的同時，也準備獨立的軍事力量和蔣介石對抗，特派中央委員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彭述之強調，中共中央聞知蔣在廣州鎮壓中共的勢力之初，並未決定對國民黨妥協，是得知國際代表不贊成與國民黨對抗之後，才決定如何對付蔣，包括盡量團結國民黨左派，以便對抗蔣，並孤立他；加強國民革命軍二、六兩軍及其他左派隊伍，以便於必要時打擊蔣²²。「中山艦事件」爆發後，同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張國燾和彭述之，均自上海被陳獨秀派往廣州了解真相，但二人對真相的了解卻大為不同。

又如，1927年4月蔣介石北伐至長江流域，因清共而導致寧漢分裂，蔣介石下野（於9月28日至11月8日到日本訪問），由譚延闓、胡漢民等在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受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汪精衛、陳公博等不贊成，自武漢回到廣州，謀另立國民黨中央，並結合張發奎等粵軍，欲驅除在廣州的桂系勢力，包括時任廣州政治分會主席的李濟深和應汪精衛之召至廣州共商國事的廣西省主席黃紹竑。此中經過，黃紹竑在回憶錄中的敘述是：李濟深因不贊同汪精衛在廣州另立黨中央，被汪利用手段趕去上海，汪並派兵襲擊黃紹竑的住處，打死衛兵，而黃因事先聞到風聲，已潛逃香港。廣州街頭上且出現「歡送李主席北上」、「打倒黃紹竑」的標語²⁶。陳公博在回憶錄中承認廣東人對桂系印象惡劣，也說李濟深支持南京的特別委員會，但謂黃紹竑係李濟深召來，並謂李要張發奎出國，同時還說驅除李是蔣介石的意思，說蔣在日本已派人與汪精衛談合作，讓汪驅李，以便蔣回粵重建革命基地。至於汪對黃紹竑的處置，陳公博並未提到派兵襲擊黃公館的事，只是說黃及時而逃²⁶。當時黃紹竑與陳公博在國民黨中屬於兩個不同的派系，而此兩派系正在鬥爭，所述難免有異。

前述兩例是回憶者自我中心或立場互異而產生的史料分歧。還有一種情形，即是在政權轉換之後，一個人在前朝任高官，到後朝又任高官，如何寫後朝建立前與前朝為敵期間的一些經歷？以下僅舉張治中的回憶錄為例。張治中為蔣介石的愛將，黃埔軍校成立之始任學生隊隊長。北伐以後黃埔軍校遷南京，改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張治中任教育長十年。期間曾任第二師師長，參與中原大戰；曾任第四路軍指揮，參與平定閩亂；曾任第五軍軍長，參與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保衛戰；曾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參與1937年的「八一三」上海保衛戰。之後任湖南省主席，次年日軍進攻長沙，湖南自衛隊焚城以抗。張以此被撤職，轉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此後常參與國共談判。戰後，曾任新疆省主席、西北軍政長官，任用不少中共人員，如迪化市長屈武、新疆省政府秘書長劉孟純。蔣介石下野、李宗仁為代總統後，張治中被任命為首席代表赴北平談判，即留在北平不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69年病逝北京²⁷。

張治中晚年在北京所寫的回憶錄中，最後一章的標題為「我與共產黨」。該章從國民黨聯俄容共期間在黃埔軍校結識周恩來寫起，有一些段落對傾心共產黨寫得很露骨，譬如「到一九二五年夏，我已經完全同情共產黨這一邊」；「我動了參加共產黨的念頭，首先向周恩來先生提出」。又譬如，提到在軍校任教育長的十年間，曾參加「一二八戰役」和「八一三戰役」，「每次戰役告終，就立刻繳令回校，避免參加反共戰爭」。再譬如1941年「新四軍事件」發生後，國共繼續對雙方關係進行協商，「自此以後，頑固派的氣焰雖甚囂張，但雙方的商談仍在不斷地進行」²⁸。且不論有關論述是否為真，如果張治中跟隨蔣介石到了台灣，就不知回憶錄會寫成甚麼樣子。

蔣介石周邊的其他人寫回憶錄者亦多，他們都為民國史提出不少見證，此處舉陳立夫等人為例。陳立夫的回憶錄源於1950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陳立夫所作的口述歷史訪問稿，到1994年正式在台灣出版中文版。陳立夫於1926年二十七歲時任蔣介石的機要秘書，時蔣為黃埔軍校校長。北伐以後陳任國民黨秘書長，抗戰期間任教育部長，抗戰結束前後任國民黨組織部長，

可以說一直在蔣左右，自然知道黨國高層的不少事情。譬如1924年孫中山為了壯大國民黨聲勢，實行聯俄容共政策。次年孫中山去世，黨政大權落在汪精衛手中。汪受到俄國顧問和共產黨人的影響，對黨內的反共人士大加排擠。蔣不滿國民黨黨權受俄國顧問和共產黨控制。依照陳的見證，汪逼着蔣去俄國，蔣已買好船票，準備自廣州搭船去香港轉往蘇俄，中途受了陳的勸說折回，決定與共產黨和親共的國民黨人一搏。1926年3月20日，蔣懷疑汪的人調動中山艦企圖將他送往別處，遂採取斷然措施，逮捕有關人員，並控制中山艦²⁹。關於此點，時任廣州公安局長的吳鐵城在回憶錄中亦有類似的記述：「他們是由俄國顧問季山嘉設計，布下陰謀，欲將蔣校長於二十日於廣州回黃埔的途中，劫持上中山艦，直駛海參崴，以便奪取國民黨的武力。」³⁰陳立夫和吳鐵城當時都是蔣介石周邊的反共派，他們的見證可信度如何，史家已有進一步的研究，茲不多論。

寫回憶錄的人各有立場，而不同的時間又有不同的立場，這是以回憶錄為史料的研究者所當注意的。雖然如此，回憶錄中常有個人特殊的記述，為諸多史事留下線索，可使史家進一步追尋。譬如在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北方政壇有不同的派系，重要者有梁啟超、外交委員會委員林長民等的研究系和曹汝霖等的交通系。據曹汝霖回憶，5月4日，北京各大學的學生以中國代表未能在巴黎和會中爭回山東的利權，自動自發地起而遊行示威，但到後期學生則全為政客利用，為人工具。因為林長民乘機作街頭演說，攻擊曹汝霖等是親日派，為了向日本借款，已答應不收回日本在山東的利權（原由德國享有，日本於參加歐戰後攻取）；實則日本答應：青島租借地俟與德國簽訂和約後即交還中國，進入濟南的日軍係暫時性，不久即撤，惟留一小部分保護膠濟鐵路³¹。

又如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各方反應不一。一般認為蔣介石能得到釋放，是受蘇聯的壓力。據時任駐蘇大使蔣廷黻回憶，事情並非這樣單純。雖然《消息報》和《真理報》均認為中國要團結，只有蔣介石能領導全國，但蘇聯政府的表現卻相當慎重，因為怕刺激德國和日本。當時蘇聯報紙報導事變是由汪精衛策動的，京滬一帶則謠傳事變的發生，是蘇聯煽動共產黨，共產黨又煽動張學良而發生的。當蔣廷黻奉命與蘇聯外長李維諾夫(M. M. Litvinov)交涉、請求蘇聯協助時，李維諾夫堅稱蘇聯政府與張學良絕無關係。蔣廷黻明言張學良是第三國際所孕育的統一戰線份子，李維諾夫則咆哮地說：「我們不是第三國際的主人。」但事變究竟是如何解決的，蔣廷黻卻說他「一概不知」³²。

需要說明的是，回憶錄作為自畫像史料，像日記、自傳、口述歷史一樣，都是隨記憶所及，信手拈來或信口道來，在時間、地名、人名、官銜、機關名稱等方面，難免記憶有誤，翻譯的作品更容易出錯。茲不多論。

四 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是歷史的起源，有文字記錄以前的歷史，或無文字的民族的歷史，原皆為口述歷史。後之學者研究有文字以前的歷史，除利用古人記下的傳說以外，又加上考古史料。無文字的民族的史料，常靠有文字的民族記錄，

記錄所本，或得自無文字的民族的口頭傳說，或得自與之接觸或從旁觀察。近數十年來史學發達，研究古史的文字和考古史料幾乎已用到盡頭，研究近代史的人別闢門徑，主動採訪史料。另一方面，由於人民的生活史日益受到重視，而一般人民留下的史料不多，亦只好靠採訪史料。在這種情形下，口述歷史才蔚然成風，人人爭為歷史作見證。

將口述歷史作為一種工作來推動，一般都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芮文斯(Allan Nevins)，謂其早在1938年即提出展開口述歷史的呼籲，希望創立一個組織，系統地收集和記錄口頭傳統(Oral Tradition)，以及六十年內參加國家、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著名美國人士的回憶。到1948年，芮文斯即開始記錄美國顯要人物的回憶。從那時起，口述史學作為當代歷史文獻研究的新手段而正式創立起來^③。作為提倡有組織地採訪口述史料的學者，芮文斯自有其功，但史學家撰寫歷史，早就以採訪的方式搜集史料。就中國史家而論，司馬遷寫《史記》走訪遺老已為史家所周知之事，後之修史者亦有用採訪的方式搜集史料。

口述歷史資料的特性是：一般文字史料，使用者無法詢問文字所記載不清的地方，而採訪者則可以向口述者反覆詢問。但口述史料有虛有實，有真有假，不能因為是當事人親述，便認為無可置疑。有幾種情形需要注意：

第一，口述者如果談其個人，算是原始材料(仍有虛實真假)，但如果談別的，就要看口述者有沒有資格為別的歷史作見證——是參與者？是旁觀者？是得自當事人告知者？還是得自一般的口耳相傳？

第二，口述歷史像自傳、回憶錄一樣，大部分人都會將比較不光彩的、不願讓人知道的事情省略，而將光彩的、正面的事情以比較誇大的口吻說出來。

第三，口述者所談，在事情發生的當時，除了自己的經歷或所見外，有些可能來自傳聞。若在事情發生多年之後才進行採訪，口述者可能又從媒體或其他著作獲得更多了解，將它們變成自己的記憶。「二二八事件」口述歷史研究學者許雪姬對此感觸最深：對同樣一個人，1987年去訪問時一個說法，1994年去訪問時又是一個說法，就是因為年月愈久，口述者吸收進新的知識愈多。

第四，同一個歷史事件，不同的受害者和加害者，會有截然不同的說法。譬如在「二二八」受害的台灣人和外省人，對事件的認識就南轅北轍。

第五，政府是統治者，人民是被統治者，如果完全採訪人民的口述資料，必然會否定前此許多以政府立場書寫的歷史^④。同樣，前此男人或精英份子為社會的主流，如悉利用婦女和一般人民的口述歷史，對以往所寫的諸多歷史都是一種顛覆。

第六，除了受訪者外，訪問者的身份和態度亦需注意。如是純粹為採集史料而訪談，所談所記較不會有偏頗；如為宣揚某種理念或達到某種特定的目的而訪談，所談所記可能有偏頗。譬如近年台灣有關機構對「二二八」受害人及其遺屬的訪談、對「白色恐怖」受害人及其遺屬的訪談，有些人只強調受害，而對所做違法之事則輕描淡寫或矢口否認，冀望多獲賠償。又如，對日治時期台灣慰安婦的訪談，均謂是被騙或被迫，而日本政府則謂是自願。

第七，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受訪者記憶不清、口述簡略，僅記口頭所講，無法成篇。有的訪問者以受訪者為名人，為使訪問稿成篇，另參考許多其他

資料，編輯成書。唐德剛為李宗仁所做的口述歷史，讀者傳誦，但唐德剛自承：「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的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面資料補充而成。」^⑤嚴格說來，這只是唐德剛為李宗仁所寫的傳記，不是口述歷史。

對民國人物有計劃地採集口述史料始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時在1950年代，主持人是韋慕廷(C. Martin Wilbur)教授，參與訪問工作的有唐德剛、夏蓮瑛等，受訪者有李宗仁、顧維鈞、胡適等。1959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合作，在台灣進行口述歷史工作，由所長郭廷以主持，參與主訪者有沈雲龍、張朋園、陳三井等，受訪者有白崇禧、周雍能、徐啟明等。其後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以及各縣市文史單位等都開始從事口述歷史工作^⑥。僅就近史所的口述歷史出版品而言，專書已有約一百種，另有《口述歷史》不定期刊十四期，選刊短篇訪問稿。筆者曾主訪董文琦和劉安祺，訪問稿由近史所各出版專書一種，此處即以《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和《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為例，說明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及有關問題。

對董文琦的訪問在1986年。董文琦，吉林人，「九一八事變」前曾任吉林市政府工務科長，抗戰勝利後曾任瀋陽市長，受訪時八十五歲，家住台北。董文琦是水利專家，但長年在東北政治圈中，對東北政情和軍政人物有廣泛的了解。筆者對他所談的問題印象最深的有三點：其一為1930年張學良率東北軍參加中原大戰；其二為「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的東北邊防；其三為戰後東北接收失敗的若干環節。

張學良自1928年率東三省歸順中央後，頗有心參與關內政治。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等聯合在華北反抗中央，使蔣介石所主持的中央政府岌岌可危，雙方都爭取張學良的支持，張學良初時不為所動，到中央派張群赴瀋陽游說，張學良始答應擁護中央，派兵入關，協助平亂。但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議袁金鎧反對派兵入關，他說：「先大元帥(張作霖)生前遺命東北軍不得再行入關，如東北軍違命入關，勢將遭閻、馮激烈抵抗，東北軍為制勝計，則需大舉出動，軍費浩繁，對東北百姓造成嚴重負擔。」張學良因已答應張群，不便背信，又以反對出兵係吉林省主席張作相主謀，最後乃由黑龍江、瀋陽二省先出兵，完成了打敗閻、馮的任務。董文琦在談到張學良出兵的條件時，說是獲得華北五省(此時華北五省為河北、山東、山西、熱河、察哈爾，到「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進佔熱河，推動華北五省自治，則加入綏遠)三直轄市的人事任命權。後來整稿時，苦無佐證，改為「中央在戰事結束後，為酬庸計，即任命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司令，此時，華北五省三特別市自然亦在其統轄之中」。

關於「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的東北邊防，依據董文琦的口述，「張學良入關擔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後，長期駐在北平，流連不返〔張學良為東北邊防司令官〕。此時東北邊防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在錦州丁憂守喪，另一副司令兼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亦因公在平，東北形勢空虛」；「此時，東北兵力雖有二十餘萬，而最精銳的部隊多已入關，所餘十多萬守軍分駐各地，僅能維護地方治安。……另一方面，整個國家處境亦十分艱難，對閻馮戰役中央損失

極重，復以湖南、江西匪禍猖獗，極需派兵清剿〔江西剿共〕，實無能力兼顧東北。加以胡漢民被囚湯山，導致兩廣叛變；又適逢民國二十年〔1931〕長江空前大水患，被災區域廣及湘、鄂、贛、皖四省。……這種種因素同時並作，遂予日本軍閥以覬覦東北之良機」。

至於戰後東北接收失敗的環節，董文琦曾提到接收人選問題，其較為特殊的是在兵馬倥傯中花精力於將東三省改為九省。當時董文琦為東北水利特派員，常參與改省會議，依據他的口述^⑳：

抗戰勝利後，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兼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在此之前，政府曾決定將原流亡在重慶南山之東北三省政府擴大組織，當時遼寧主席為萬福麟、吉林主席為鄒作華、黑龍江主席為馬占山，政府並令他們積極準備前往東北接收。不料他們正在積極籌劃，並已將省府廳處長人選呈報核示時，中央忽有將東北三省改為九省之議，一時議論紛紛，不知究竟。後聞係熊式輝受命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後，即建議將東北三省改為九省，亦即將原偽滿十八省兩省併為一省，極不合經濟與人口分布之原則。

東北九省確定後，勢需另定各省主席及廳處長人選。俟各省主席及廳處長確定後，熊式輝又在設計局不斷召集會議，商討各省編制、預算及接收事宜。每次開會，中央各部會東北特派員均奉邀參加。我當時為東北水利特派員，應邀參加，親見每次討論均與政策大計無關。此時東北局勢日在變化，而我們未能因變制宜，爭取時間，殊為可惜。

董文琦的訪問錄，可能因為流傳不廣，或因所談多為水利之事，未見讀者有任何反應。所談有關東北政事，東北重要人物張學良、梁肅戎以及以辦《傳記文學》有名的劉紹唐等都在台灣，均不曾對該書表達任何意見。

為劉安祺將軍作口述歷史在1989年，當年他八十多歲，記憶力驚人，從來不會看着資料唸。劉安祺，山東嶧縣人，抗戰期間曾任師長、軍長，戰後曾任第十一綏靖區司令長官（駐青島）、金門防衛司令官、陸軍總司令。1995年病逝台北^㉑。劉安祺為人謙和，常怪別人所做的口述歷史「不是怪罪長官，就是怪罪部下，都不肯自我檢討」。他原不願作口述歷史，經筆者和劉安祺的胞弟多年勸說，始勉強答應^㉒。

口述歷史出版後，在《中央日報》「長河」副刊連載一部分^㉓，引起讀者廣泛迴響，筆者作為主訪人，收到許多來信。有些信件是人名、地名、時間、番號等的勘誤或作史實補充，有些信件則直指所述有不公正處、有不實處。譬如一位士官原服務於劉汝明的警衛營，到台灣後被編入孫立人的警衛營，對劉安祺說「孫立人沒有張學良高明」大為不滿，數落了張學良若干罪、宣揚了孫立人若干功，並指劉安祺對孫立人為何被整交代不清。劉安祺說孫立人不是兵變，也不是兵諫，只是與美國太接近，沒有好的參謀人員。但這位士官的觀點是：孫立人不是黃埔畢業，是被黃埔人排擠。另一位孫立人的部下（不詳其職級），說劉安祺指孫立人將司令台上的國徽換成火炬、把帽花也換了，近乎荒唐，並指出帽花未換，而司令台上有火炬，亦有國徽。還有一位孫立人的部下（亦不詳其職級），說孫立人曾為劉安祺的長官，批評長官欠忠

厚，且無事實根據。除孫立人的部下外，胡璉的部下對劉安祺標榜防衛金門及綠化金門之功，也大不以為然，說劉任金門防衛司令官時「八二三炮戰」已結束（事實上炮戰並未結束），又說綠化金門是由胡璉開始⁴⁸。

劉安祺的訪問錄出版後，不僅因為批評到其他單位的長官而引起這些單位的人反駁，即便是本單位的人，也因為某些次級單位被忽略或被誤解，而有所不滿。譬如劉安祺在做金門防衛司令官時，部下有第五十八師，該師為重裝師，師長為張錦錕。該師的前身為第三十二軍二五二師，自防守青島到防守海南，到撤退台灣，一直是劉安祺的部下，該師亦隨劉防衛金門，但劉在口述中卻未提到第五十八師。不僅如此，劉且將第五十八師於做工事時發現明宗室魯王（朱以海，據金門以抗清）墓，說成第四十九師發現。事後至少有兩封來信，對此一事實提出辯證。又譬如劉安祺訪問錄中，收錄了他的部下的補述部分，其中常持琇（時在劉安祺的二十一兵團部主管作戰）在檢討1949年陽江撤退時，對黃毓峻任團長的八零八團如何突圍產生懷疑，懷疑該團是未接命令，事先突圍，因為該團完完整整經過雷州半島到了海南，而其他部隊損失慘重。黃毓峻為此寫信向常持琇抗議，說明該團於掩護友軍撤退後，奉參謀長周聲夏之命撤退⁴⁹。

除前述者外，指出其他錯誤者亦多，茲再舉數例。其一，劉安祺在口述中說，一般人批評胡宗南戡亂失敗，是不公平的，因為胡的精銳部隊都被調走，譬如第五十七軍（劉安祺為軍長）調到雲南，第一軍調到北平，第十六軍調到晉東南。一位劉安祺手下的老兵不同意，謂第五十七軍未必最能打仗，第一軍一直都在胡宗南的第一戰區，調到北平的是第十六軍。其二，劉在口述中說，1950年，舟山指揮所主任是樊崧甫。一位除役少將在信函中指出：舟山指揮部主任是郭懌，樊崧甫早因親共在上海為湯恩伯扣押。其三，劉在口述中說，在擔任金門防衛司令官期間，主要的軍力為第十軍，由張國英兼軍長，師長有陳桂華的第十七師、郝柏村的第九師、楊又曾的第四十九師和江無畏的第四十一師。一位讀者在信函中指與事實不符，謂金門炮戰期間，守備金門的陸軍有郝柏村的第九師、林初耀的第二十七師、馬安瀾的第十師、胥立勳的第四十一師、張錦錕的第五十八師、曹傑的第六十九師。炮戰結束以後，師長有調動，師的駐防亦有調動。其四，劉在口述中所談的國防研究院，亦有讀者在信函中指正：國防研究院共辦十二期，非十三期，每期受訓學員六十人，非二百人；國防研究院成立後，原革命實踐研究院並未取消，而是遷往溝子口，對外用青邨名義，招訓省級幹部⁵⁰。

前面所指出的諸多問題，受訪人均未答覆。茲將口述記錄原文或原意引出，並作如下的說明：

關於胡宗南在抗共戰爭中的表現，胡於抗戰時期在西北阻擋日軍西進、限制中共勢力擴張，對國民政府有其貢獻，但於戰後在抗共戰爭中失敗，劉安祺說是因為他的精銳部隊都被調走，譬如他的第五十七軍被調到雲南，第一軍被調到晉東南，第十六軍被調到北平。劉並未說他的第五十七軍最能打仗。

關於陽江撤退，係指1949年劉安祺的部隊奉命自廣州向雷州半島撤退，中途被共軍逼到陽江（廣州至雷州半島半途的濱海城市）。劉安祺說，最後打

了一仗，司令部的司機、參謀都被打死，最後剩下十餘人，乘幾艘小漁船找到海軍的大輪船才逃到海南。至於他的部隊，全部四個半師，大部被共軍衝散，「到海南島之後，衝散的人陸陸續續回來的超過半數，像黃毓峻那一團本來被敵人隔斷，後來也回來了」。引起爭論的是常持琇的補充發言，前已說明，不贅。

關於舟山指揮所主任，劉在口述中說：「我的部隊於民國三十九年〔1950〕二月抵達台灣，稍加整頓之後，便擔任高雄以北到新竹鳳山溪海岸的防務。這時老先生〔蔣總統，下同〕為了鼓勵我……就發表我兼舟山指揮所的副主任。……當時的指揮所主任是樊崧甫。」樊崧甫曾任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1947年1月退役，寄居上海，從事反內戰活動。曾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入獄，中共佔上海後被釋。劉安祺的記憶可能有誤。

關於劉安祺調防金門以及金門的駐軍、綠化和發現魯王墓，劉在口述中說：「四十七年〔1958〕八月二十三日，金門發生炮戰，當時戍守金門的司令官是胡璉。這一仗打得很辛苦，吉星文、章傑和趙家襄——這三個人中有兩個當過我的副司令——三個副司令官都在『八二三』當天陣亡。後來胡璉眼睛不好，一再要求回台，那時炮戰正急，選將很困難，……〔老先生〕就派蔣經國連夜到高雄找我，徵求我的同意。」「我在金門前後四年……主力是第十軍，由張國英兼軍長，師長有現任銓敘部長陳桂華（十七師）、郝柏村（第九師）、馬安瀾（第十師）、楊又曾（四十九師）、江無畏（四十一師）等。」「我初到金門的時候，金門一片黃沙，沒有一點綠意，後來在沈宗瀚先生主持之農復會的協助下，我們派人到菲律賓買草種，到小琉球買樹苗，農復會也提供不少樹苗和技術，把金門整個綠化起來。」「四十九師有一個連完全是山東人，這個連奉派在古崗湖修築炮兵陣地，有一天忽然發現一個古墓，上面寫着『魯王墓』……」有人指出發現魯王墓的不是四十九師，而是五十八師；又有人指出駐軍番號有問題，可能口述者記憶有誤。至於所述綠化金門，並未說胡璉未做綠化之事。

關於國防研究院，1968年8月劉安祺任國防研究院副主任，依據他的口述，他從第八期辦到十三期，一期大約兩百人左右；國防研究院之前設有革命實踐研究院，成立國防研究院的時候革命實踐研究院已經取消，劉安祺離開國防研究院一段時間後，革命實踐研究院又取而代之。提出不同記憶的是國防研究院的一位學員，實際的情形則有待查證。

關於張學良，劉安祺在口述中說：我在第二軍團期間，老先生叫我照顧張學良；張學良比孫立人高明，他始終無怨言，始終覺得他對不起老先生。窺其原意，並非誇張學良在別的方面比孫立人高明，只因張學良知所收斂，故得以保全。孫立人則不然，照劉安祺的說法^④：

他不知道哪些人〔指出身黃埔的官兵〕是老先生如何培養出來的，也不曉得當日政工對軍隊的重要性。他當訓練司令、〔陸軍〕總司令以後，至少和我同一階層的人資格都比他老，但他辦訓練時，叫我們穿着短袖、戴着草帽、坐小板凳，把我們當小兵訓；一講話就罵政工、罵黨、罵陳誠，甚至傷害到蔣經國。而且他連北伐時期就開始使用的臂章、帽花都更換，又把鳳山閱兵台的黨徽換成一個火把，這些都是不高明的措舉。不

僅如此，他辦了一個第四訓練班，都用新臂章、新帽花。那還不說，他又結小團體，裏面有共產黨挑撥，故隨後發生的兵諫也好，兵變也好，都由此而來。我想，兵變在我的客觀判斷是不至於，預備兵諫可能是真的。……尤其是美國人〔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很想利用他，麥克阿瑟在東京召見他是個事實，而且麥克阿瑟還是誰告訴他：台灣這個爛局面一定要孫立人才能挑起這個任務，因此他多少有所恃。

劉安祺訪問錄的案例顯示：即使是自己親身經歷的事，也可能記憶錯誤；對自己周邊的事，或得自傳聞的事，所述未必可靠。論事若涉及批評或貶抑別人，如為別人或別人的關係人所知，必然引發爭論。此外，口述歷史工作者所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如出版的口述歷史記錄對別人不利或揭發別人陰私，會被控告毀謗⁴⁶。

五 結論

歷史研究的資料多端，研究民國人物，有比研究其他時期人物更多的資料，即各種不同形式的自畫像資料。日記、自傳、回憶錄和口述歷史，一般說來有幾個共通性：第一，以自我為中心，品人論事；第二，隱惡揚善，文過飾非；第三，透露內心世界，記錄私密關係。四種自畫像資料中，只有日記能留下不同年代的自我，欲了解日記作者整個的自我，需要仔細拼圖。自傳、回憶錄和口述歷史亦有其共通性：第一，以記述或口述時為基點，重塑自己的形象，未必是成長或發展過程中的形象；第二，所提供的資料未必全是自己的經歷和見聞的記憶，可能有許多是當時或事後得自別人的資料。

作為民國人物自畫像，日記的資料通常是人物所想留下的形象，未必是他的本像，但日記資料比較零碎，也許在拼圖的過程中，能發現表面資料以外的形象。自畫像資料未必全然扭曲，讀者如能警覺自畫像者的自我中心、自我誇張、自我粉飾、愛憎情節、黨派偏見等因素，而作者確能如實記錄、如實述說，仍能從自畫像資料中窺見其身影的大概。

一般說來，自畫像資料，正面者較多、負面者較少，研究一個人物不宜只用自畫像資料，但若缺乏其他參考材料，仍不失為一種暫時性的史料。此外，日記、自傳、回憶錄和口述歷史中的資料，除了自畫像的部分外，尚有許多為其他史事作見證的史料，雖然也可能有主觀、有偏見、有錯誤，但仍然是一種史料。有的可以暫時作為主證，有的可以作為旁證。研究民國史上的大人物，在自畫像史料未出現以前，所用多為官文書、報刊資料和坊間野史，所寫多為表面形象，到自畫像史料出現後，才能略窺人物的內心世界。內外合一，綜合分析，人物的形象會更逼真。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近數十年人民的歷史受到重視，研究近代人民的歷史，非借用口述歷史不可，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和性別歷史的研究能夠獲得進一步推展，與口述歷史的運用很有關係。不過，為人民歷史和性別歷史所採集的許多個人資料，基本上不是一個人的畫像，而是一個群體的畫像，因此相關的人都可以作證，雖然證詞會有許多分歧。

註釋

- ① 參見馬振犢：〈蔣介石日記原本與毛思誠作類抄、年譜比較初探——以1927年7月為例〉，載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台北：世界大同出版公司，2011），頁81-117。
- ② 呂芳上：〈序〉，載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台北：國史館，2011），頁1-11。
- ③ 參見維基百科的「日記」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8%AE%B0>。
- ④⑫ 桑兵：〈日記內外的歷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載《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頁77；80。
- ⑤ 參見維基百科的「蔣介石日記」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4%BB%8B%E7%9F%B3%E6%97%A5%E8%A8%98#1947.E5.B9.B4>；潘邦正：〈蔣中正日記的保存、開放及其影響〉、呂芳上：〈蔣介石日記與日記中的蔣介石〉，「開拓或窄化？：蔣介石日記與近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年12月27日）。
- ⑥ 參見張玉法：〈蔣介石日記的史料性質〉、吳淑鳳：〈淺談蔣介石研究的史料問題——事略稿本與日記的比較分析〉，「開拓或窄化？：蔣介石日記與近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 ⑦ 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一至三輯（香港：三聯書店，2008-2014）。
- ⑧ 王成勉：〈求真何其難——評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6年6月號，頁142-51。
- ⑨ 參見呂芳上：〈序：提供史料不提供觀點的盛會〉，載《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頁4。
- ⑩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1990）；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胡適日記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 ⑪ 以上內容參見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
- ⑬ 參見馮玉祥：〈自序〉，載馮玉祥著，余華心整理：《馮玉祥自傳》（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頁1。該書從家世寫到1929年1月請假養病，判斷為養病期間所寫，但未見原稿。據以出版的書稿係1956年在北京舊書店尋獲的手抄本，全稿十餘萬字。
- ⑭ 參見馮玉祥：《馮玉祥自傳》，頁169。
- ⑮ 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上海：文化出版社，1949）。
- ⑯ 參見陳濟棠：《陳濟棠自傳稿》（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4），頁31。
- ⑰ 參見維基百科的「陳濟棠」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6%BF%9F%E6%A3%A0>。
- ⑱ 參見陳濟棠：《陳濟棠自傳稿》。
- ⑲ 施家順：《兩廣事變研究》（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頁47-70。
- ⑳ 參見王杰、梁川主編：《枕上夢回：李漢魂吳菊芳伉儷自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
- ㉑ 陳蘭村：〈古代名人自我心靈的系列畫像——《中國古代名人自傳選》前言〉，載《中國古代名人自傳選》（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6。
- ㉒ 黃紹竑：〈引言〉，載《五十回憶》，上冊（杭州：雲風出版社，1945），頁2-3。
- ㉓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1973），頁498-99、505-506。
- ㉔ 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2-6。張國燾的回憶錄原在香港《明報月刊》連載，彭述之所評係連載之文。彭述之的口述歷史《彭述之回憶錄》，上卷寫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下卷寫中國第二次革命和托派運動。參見彭述之口述：《彭述之回憶錄》（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
- ㉕ 黃紹竑：《五十回憶》，上冊，頁187-95。

- ⑳ 汪瑞烟、李鐸、趙令揚編註：《苦笑錄：陳公博回憶，1925-1936》（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79），頁156-63。
- ㉑ 參見維基百科的「張治中」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5%E6%B2%BB%E4%B8%AD>。
- ㉒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下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664、669、684。
- ㉓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台北：正中書局，1994），頁52。
- ㉔ 吳鐵城：《吳鐵城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69），頁158。
- ㉕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頁145-46、152-57。
- ㉖ 蔣廷黻著，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蔣廷黻英文口述稿》（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197-99。
- ㉗ 參見Allan Nevins, "Oral History: How and Why It Was Born", in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ed.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K. Baum (New York: AltaMira Press, 1996), 29-38。
- ㉘ 第二至第五諸條，參見許雪姬：〈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載《口述歷史進階研習營學員手冊》，頁88、89、91。
- ㉙ 朱浚源：〈論口述歷史訪問的方法〉，載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第三次（八十二年度）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紀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72-73。
- ㉚ 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史料指引》（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頁146-48。
- ㉛ 以上所引董文琦口述資料，參見張玉法、沈松僑訪問，沈松僑紀錄：《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34-35；35-36、297；282-83。
- ㉜ 〈前言〉，載張玉法、陳存恭訪問，黃銘明紀錄：《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1-3；另參見維基百科的「劉安祺」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5%AE%89%E7%A5%BA>。該網謂劉為山東微山縣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改嶧縣為微山縣。
- ㉝ 張玉法：〈回憶為劉安祺將軍做口述歷史的那段日子〉，《山東文獻》，第21卷第4期（1996年3月），頁27-28。
- ㉞ 參見《中央日報》，1992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
- ㉟ 以上所舉各信函，署名人分別為于翔麟（僅有勘誤表，無日期）、周健（勘誤表，1991年9月13日）、張一亮（1993年5月16日）、何伯群（1993年1月1日）、章友仁（1992年12月8日）、莫珩（勘誤，1992年12月16日）、向生（勘誤，1992年11月28日）、朱思堯（勘誤，1992年11月13日）、楊繼高（勘誤，1992年11月17日）、吳秉衡（勘誤，1992年11月20日）、王禹廷（無日期）。所引信函為筆者私藏。
- ㊱ 所引信函署名人為蘇述棟（1992年11月22日）、葉繼業（1992年11月30日）、黃毓峻（1993年2月1日）。信函為筆者私藏。
- ㊲ 以上所引信函，署名人為老兵（12月6日，原函未寫年份）、金福民（1992年12月7日）、倪岱峰（12月5日）、陸明仁（12月26日）。信函為筆者私藏。
- ㊳ 以上所引劉安祺口述資料，參見張玉法、陳存恭訪問：《劉安祺先生訪問紀錄》，頁20-21、129、140-41、151、159-62、166-67、169、218-19、250-51。
- ㊴ 譬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談到俞大維之子俞揚與蔣經國之女蔣孝章結婚的一些波折，當事人於2001年6月控告溫哈熊和近史所毀謗，後因被告提出其他出版品對此事早有論及，法院站在維護學術自由的立場，判決被告無罪。參見劉鳳翰訪問，李郁青紀錄：《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沈懷玉：〈口述歷史的倫理問題〉，載許雪姬主編：《台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台北：台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頁70。